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回望一甲子

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SSAP

回望一甲子

——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ISBN 978 - 7 - 5097 - 1475 - 1

I. ①回… II. ①中… III.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 - 纪念文集
IV. ①G322.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928 号

回望一甲子

——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徐思彦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48.5

字 数 / 83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75 - 1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CONTENTS

录

序 步 平 / 1

编辑说明 左玉河 / 1

上编 老专家口述访谈录

丁伟志先生访谈录..... 3

丁守和先生访谈录 14

王仲女士访谈录 88

王庆成先生访谈录 97

朱东安先生访谈录..... 105

刘志琴女士访谈录..... 130

刘敬坤先生访谈录..... 159

庄建平先生访谈录..... 171

杨天石先生访谈录..... 181

李瑚先生访谈录..... 200

余绳武先生访谈录·····	207
张振鹍先生访谈录·····	220
张海鹏先生访谈录·····	231
周新民先生访谈录·····	291
耿云志先生访谈录·····	301
贾熟村先生访谈录·····	377
章伯锋先生访谈录·····	380
韩信夫先生访谈录·····	394
蒋大椿先生访谈录·····	426
曾业英先生访谈录·····	462
蔡美彪先生访谈录·····	496
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505

下编 老专家怀念与回忆

我与近代史所·····	丁贤俊 / 525
西藏纪行·····	王 仲 / 537
我和近代史研究所·····	王庆成 / 565
耳闻目睹五十年感言·····	王庆基 / 571
大师凌绝顶 晚辈影随形 ——我与近代史研究所·····	王 杰 / 573
树立精品意识 贯彻精品战略·····	从翰香 / 592
九十自述·····	曲跻武 / 594
我所知道的“近代史讨论会”·····	刘存宽 / 597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刘志琴 / 607
近代史所的磁性·····	刘德鸿 / 613
“四清”记·····	李 新 / 616

难忘淳淳师友情

——我与近代史所 李 珣 / 634

悠然自得三十年 严如平 / 640

历史家的品格

——记黎澍师 陈铁健 / 647

缅怀敬爱的范老 张玮瑛 / 662

忆往事 谢同仁 张显菊 / 664

毕生的幸运

——近代史所一甲子简记 张振鹞 / 670

“右派分子”始末 张振鹤 / 683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张海鹏 / 697

我在近代史所的二十一年 赵云田 / 706

罗尔纲和《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续编》 赵云田 / 713

我的近代史所情结 闻少华 / 717

我与近代史所 郭兴仁 / 724

《近代史研究》初期工作回忆 曾景忠 / 731

回忆范老论学四则 蔡美彪 / 746

琐事杂记 潘汝暄 / 755

编辑说明

（一）近代史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最早建立的一个专业研究所，到现在已有整整 60 年的光辉历史了。60 年中，近代史所涌现了范文澜、罗尔纲、刘大年、黎澍、李新等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出版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立了全国最高学术中心的地位，并在国际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学术重镇，有必要认真编写好所史，有必要将老一代学者开创并形成的优良学术传统和务实严谨的学风继承下来。这是我们组织这部《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的初衷。

（二）由于岁月的流逝，那些当年曾经为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专家学者，有的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多数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这些 50 年代进所的老专家（老干部），经过的事很多，他们个人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史研究所走过的风雨历程。这些离退休老专家（老干部）对近代史所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近代史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比较清楚，但受制于年龄及健康状况，他们难以像年轻人那样拿起笔来撰写回忆录，将自己知道的当年近代史所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因此，作为近代史所的后继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这些老专家进行口述访谈，以口述访谈的形式发掘并保留下这批丰富的资料。

（三）目前全所离退休的老专家（老干部）有 130 多人。从进所时间上看，这些老专家（老干部）大概可分为三批：一是 50 年代建所初期进所的老专家（老干部），目前约有 20 位；二是 60 年代前期（主要是“文革”前的 1963～1964 年）进所的老专家，有 50 多人；三是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

初期进所的老专家，有30多人。50年代最早进所的老专家，多数已经80岁开外，甚至有的已经90多岁，亟须对其历史经验进行资料抢救。故我们拟集中精力，首先对50~60年代进所的老专家（老干部）进行口述访谈。最初拟第一批采访的老专家有30多位，因一些老专家身体病弱，只好推迟；有一些老专家表示这次只撰写回忆性文章，相约日后再进行口述访谈；还有些老专家还未及访谈便不幸病逝。故我们在这里收录的老专家口述访谈录，只有20余位。其他所内外老专家，容我们稍后继续采访整理。

（四）我们对老专家的口述访谈，以其亲身经历的事情为主，坚持“所历、所见、所闻”原则，按照口述历史访谈的规范进行。主要内容包括：我是如何进入近代史所的；我在近代史所工作、学习及生活的往事；我所经历的近代史所的若干事情；我所了解的近代史所的同事们（如范老）；我所知道的有关近代史所学风与学术传统，等等。接受访谈的老专家，以对历史负责的严肃精神，围绕上述问题畅所欲言。但因时间久远和记忆模糊，这些老专家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这种情况，是口述历史无法避免的问题。口述历史与其说提供给予人们历史的真实，毋宁说是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我们希望这些访谈能给予人们更多的历史线索，引导更多的当事人讲出更多的线索，进而复原那段丰富的历史。

（五）我们对这些老专家的访谈，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访谈时间长短不一，故根据这些谈话录音整理的文字篇幅也有很大差异。我们在根据录音整理文字时，除了进行必要的文字润色和加工外，一般不对访谈内容作大的改动。考虑到某些访谈内容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的人和事，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宜公开披露，故我们在整理访谈录音时，反复与老专家沟通协商，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同意，而将一些人和事暂时隐去。被隐去的部分内容，我们将妥善保存下来，以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补上。当然，我们也非常尊重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凡是他们坚持要公开发表的，我们没有强行阻止，更没有权力加以删除，只能最大限度地给予保留。马克思说：“历史是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叙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访谈对象全部是历史学专家，他们深知历史证据的重要性，自然会为自己提供的这些历史证据负责，文责自负。故我们作为访谈整理者，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整理出来的文字，多经过老专家审定，不代表整理者的意见。我们希望更多的当事人起而撰文，或再以口述访谈的形式，回顾那段峥嵘岁月，为后人留下一份信史。

（六）当我们紧锣密鼓进行口述访谈的过程中，一些老专家，如丁守和、周天度、余绳武、刘敬坤、瞿同祖、史洛明、张德信等，或因年事已高，或因身体病弱，在这两年间相继离开了我们。这些仙逝的老专家，有的虽然进行了访谈，但许多方面尚需深入；更多的则是根本尚未来得及进行口述访谈。这些老专家的匆匆逝去，令我们晚辈于悲痛之余，感受到深深的遗憾，同时更强化了我们抢救口述史料的紧迫感。想着那些时刻在与病魔搏斗的老专家，我们真的觉得有责任抓紧时间做点抢救工作，赶快给他们做口述访谈，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对世界的美好记忆，留下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责任。

（七）做口述历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是默默奉献的事情。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一点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就根本不会来做口述史，也根本做不好口述史工作。从事对老专家进行口述访谈者，多为本所中青年学者，他们是怀着对本所老专家的崇敬心情及对后人负责的历史责任感来做这项工作的。从访谈的前期准备，到往返多次的访谈，再到访谈资料的整理，他们都付出很多的辛勤劳作。如果这部访谈录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那应该归功于这些青年学者的辛勤劳动；如果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请本所同仁及学界朋友们给予宽容和谅解。

（八）在对老专家口述访谈的同时，本所还组织了“我与近代史所”的征文活动。老专家们纷纷撰文，对近代史所已往的人和事进行回忆。这些文章本拟单独结集出版，但因种种原因，所领导决定以“老专家回忆”的题目，合并到这部“访谈录”中。黄春生、刘丽、崔军、李桂华、刘宝林等人为组织、打印、校对这些文章做了不少工作。这项口述访谈工作是在所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在此，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由衷地感谢所领导及所党委给予的支持和理解。

左玉河

2010年4月

序

步 平

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60年在干支组合的纪年方式中恰好是一个周期，而这一周期，无论对于大到社会还是小到具体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近代史研究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正式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史研究所的60年是与祖国同行的60年。

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38年5月5日在延安建立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问题中，意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于是在马列学院中建立了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作为历史研究室主任，组织成立“中国历史研究会”，并接受了用新观点编写简明中国通史的任务。从此，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承载回答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将中国的救亡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而诞生了。此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后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范文澜兼主任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始终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与现实革命斗争需要密切相关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做，克服无政府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1945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创办北方大学，范文澜在担任北方大学校长的同时，也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刘大年、荣孟源、王冶秋、尚钺等历史学家作为研究室成员，在范文澜的领导下，修订《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身)时,作为副校长的范文澜仍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在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的同时,还受中宣部委托,承担为迎接全国解放组织编写历史课本的工作。华北大学迁入北平后,历史研究室由正定迁来北平东厂胡同一号,对外称华北大学历史所。1950年5月1日划归中国科学院,命名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此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1954年,中国科学院为加强历史学科建设,组建三个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改称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59年,恢复近代史研究所名称。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建所初期,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配合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二册(自辛丑和约至五四运动)的编写而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收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材料,准备撰述长编,第三部分为适应当前需要而进行专题研究。1953年开始加强近代史专题研究,全所分为近代史组、现代史组、通史组、史料编辑组。近代史组分设经济史组、政治史组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后改为中外关系史组),初步奠定了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机构设置。

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后的主要研究目标是编写《中国通史》和编纂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期间,首先完成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为编写多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进行了尝试;集体编写并出版了《帝国主义侵华史》;成立了专门研究中俄边界历史的机构,为外交部中苏谈判代表团的谈判工作提供学术服务,同时研究沙俄侵华历史;修改、补充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建所初期对资料建设极为重视,首先完成了对文管会交来的重约15吨以北洋政府时代史料为主的档案资料的整理;成立了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的“南京史料整理处”,到1959年整理了210万件(当时总计260余万件)档案文献;创办了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近代史资料》,至1966年停刊时共编辑出版35辑并11种专刊;选编了专题档案资料、编辑了《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等,为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史料基础。即使在“文革”中各项工作受到冲击,面临瘫痪的情况下,近代史研究所仍派出人员搜集“文革”时期的资料,所以,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当时的报纸种类至今堪称世界之最。

建国初期的十几年，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近代史所学人的积极性并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近代史所出版的学术著作在数量上并不多；在学科建设上虽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并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但由于随后的十年“文革”的冲击，很多计划设想难以落到实处。

1978年以后，随着对当代中国的命运产生重大根本性影响的改革开放的深入，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大范围拓宽、研究资料全方位的深入发掘、研究方法的广泛吸收与创新、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成果的目不暇接，成为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繁荣与发展的证明。而近代史所积极响应时代要求，改善治学环境，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扶植新兴学科，组建新的研究室，加强中国近代史各分支学科的建设，薪火传承由范老等学者开创的严谨求实的学风，在老专家和新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学术研究上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设有10个研究室，即政治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思想史研究室、史学理论研究室、革命史研究室、民国史研究室、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台湾史研究室、资料编译室；完成并出版了12卷本的《中国通史》、10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9卷本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等一大批具有学术影响的近代史代表性的著作，正在进行《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已经建成为中国近代史类藏书最完整的专业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的网站已成为国内最受关注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网站，《近代史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两种刊物则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全国近代史研究方向的名刊。

在近代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到来之际，许多学者建议我们说：鉴于近代史研究所的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60年来的曲折的发展，鉴于总结近代史研究所的经验对于发展近代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当编写近代史研究所的所史。我们十分感谢这些学者的关心与信任。我们虽然编写过多种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专著，但是对于从事严谨的历史学研究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来说，编写自己研究所的历史，却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

首先，“文化大革命”前的近代史研究所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科研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制度，以至关于那一时期的资料十分片断，而“文化大革命”更中断了科研工作和科研档案的收集，许多问题缺少必要的资料的佐证。其次，当事人对各种问题观察角度的不同及其历史体验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在深入交流取得相互理解和共同认识之前，对诸多问题的判断仍存在仁智互见的现象。所以，越是编写接近当代的历史，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越是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推动所史的编写进程，我们决定首先编写近代史研究所的大事记，同时开始征集关于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史，以为将来编写所史预做铺垫。

60年来，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学人共同努力取得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所同仁的参与。正是由于尽职尽责的每一位同仁的有限力量的汇聚，才促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蓬勃的发展。所以，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过以及见证了近代史研究所发展历程的每一位同志，都可能为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史提供素材。现在呈献给读者们的口述历史文集是第一册，将来随着口述历史工作的深入进行，还将继续结集出版第二册、第三册……

现在的这部口述史，是由在近代史所工作过的同志们，特别是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研究所工作的老专家们口述或撰写的，这里面有对经验的总结，有对教训的反思；有对同事的缅怀，有对友谊的颂扬；有对错误的检讨，有对误解的宽容……。从他们的口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近代史研究所在60年的历程中积累那么多的宝贵治学经验，像“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像“眼勤、手勤”，搜集资料一定要“竭泽而渔”的勤奋态度；像对各种说法仔细考证的“锱铢必较”的原则，等等。我们也可以体会出：尽管在那些年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动荡，但是，学者自己的自爱、自尊，对同志、对朋友的友爱、平等，领导作风的民主与不拘泥于形式主义，也都是十分值得发扬的作风。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当然，与近代史研究所以往完成的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是：这部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自己做的口述史。历史学者对于自己研究的领域，把握史料充分，分析驾轻就熟，而在成为口述历史的叙述主体的时候，无论有多么高深的学问，在面对采访者时所表达的仍然是一家之言。

近代史研究所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在其60年的发展中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清晰地记录着时代的脉搏。口述历史记忆那一时代的影响，

因此不可能回避具体的人与事，但是由于年深日久、作为个人的记忆难免淡漠，所以口述历史的内容中难免产生讹误；另外，尽管许多问题是时代的原因而不是个人的责任，但是对同一历史过程，也可能存在从不同角度产生的不同感受。不过，作为历史学者，我们都知道这是口述历史记录的基本特征，口述历史的记录可以成为严谨的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资料，但还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历史学家的觉悟，在于高屋建瓴地审视那一时代，在于认真全面地审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体验，以“无己”的胸怀看待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从中找出经验教训。有心的读者在阅读了本书中那些专家学者们的回忆后，一定会深深地体会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与近代中国历史一样，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与艰辛，有成就，也有教训；有晴朗，也有阴霾；有喜悦，也有悲伤。前辈的学者们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验，也留给我们许多尚待解决和深化的任务。

而从做口述历史的角度看，这还是一项十分辛苦而且需要专业知识和奉献精神的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将这项工作作为 2009 年的所重点课题，由多年从事口述史研究及实践的左玉河研究员负责，约请卞修跃、刘萍、毕苑、李仲明、李学通、李细珠、李彬彬、李在全、杜丽红、吴敏超、张志勇、邹小站、赵立栋、赵庆云、罗敏、荣维木、侯中军、夏春涛、柴怡赟、葛夫平等本所中青年学者参加，对老专家进行口述访谈。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怀着对本所老专家的崇敬心情及对后人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参与这项工作，付出辛勤劳动，才有这样的成果的产生。也让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60 年在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新中国在这一个 60 年中完成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国际形象，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的愿望，而与祖国同行的近代史研究所，也在 60 年的过程中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体系。抚今追昔，我们深深感谢为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代代学人，我们将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开创新的更加辉煌的第二个 60 年。

丁伟志先生访谈录

毕 苑 访谈整理*

丁伟志，山东潍坊人，1931年1月生。1947年夏，考入北京志成中学读高中。1948年7月，入华东大学学习。1951年11月，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读研究生。1953年2月，入马列学院，修读哲学专业。1955年夏，完成研究生课程后毕业，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73年10月，调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参加范文澜著《中国通史》新版的编撰。1975年9月，调至《历史研究》杂志社，任副主编。1980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1985年7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1988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1995年底离休。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一 “革命”年代的读书与成长

■：作为一个晚辈跟学部委员访谈交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我很高兴。就像我给您的邮件中说的，这种高兴的感觉大过了荣幸。虽然以前没有见过您，但是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读过您的书，领会到您中西体用研究的意义，那书给我的震动是很大的。今天终于见到您了。您在两部随笔集《无树有巢》和《桑榆槐柳》中，谈了一些您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经历。从

* 由于一个难得的机缘，毕苑接受了访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丁伟志先生的任务。2007年4月，毕苑在华威西里丁先生家中对这位儒雅师长作了学术访谈。2010年4月中旬，毕苑再次对丁先生作了口述访谈。该文根据这两次谈话录音整理而成，最后经丁伟志先生审定。

书里看，丁先生的家世是很不错的。

●：谢谢。我出身的家庭环境按说算是有些文化的，是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历史学家。父亲的藏书，是我少年时期获得精神食粮的宝藏。从小学三四年级起，我便从父亲的书房中找出书籍阅读，有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名著，也有“五四”以来新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还有外国作家的名著。读起来贪得无厌又生吞活剥。因为父亲去世早，我只能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在盈橱盈架的图书中穿梭乱翻。稍稍长大，成了一个有些懂事又不太懂事的大孩子，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和学术更是失之交臂了。动荡的战争环境，童子功没打好，不像你这个年龄的人有良好的读书条件。

■：您小时候在北京小红罗厂住过？感觉那里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在那里住了不到两年。那是40年代初，举家寓居北京小红罗厂禹贡学会旧址，熬着《四世同堂》里的那种日月。那个旧址现在完全没有了，50年代就没有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很荒凉，房子很少院子很大，就在毛家湾前面，中央文献研究室往南一带。我在北京还住过三个地方：宣武门里的抄手胡同，赵登禹路那儿的跨车胡同，西单广场民族饭店背后的白庙胡同，如今也都没有了。北京变化太大。

■：您上过学的地方也很多？

●：所以基础没打好。我一生只毕过两回业，一是小学毕业，一是号称研究生毕业，就这两头。在青岛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小学就转了五六个学校才读完。初中没毕业，就上了高中，高中没毕业，就参加革命，大学门槛一天也没进过，建国之初又推荐我们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头，不是完全身由自主。不像你们按部就班一直学下来，打好了外语基础。

■：是啊，我们能够按部就班地读书。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讲，最感兴趣、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您这一代人年轻时候参加革命的感受。

●：我们小时候没有设想将来要从事什么，参加革命就是“入伍”，跟参军一样。说句大话，那就是想做职业革命家。打起背包就走，叫上前线就上前线，什么个人考虑都没有。思想很单纯，的确是一腔热血。压根儿没想到后来我会以编辑或者学术研究为职业。

■：那您理论基础成型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1949年之后了。1951年秋，人民大学挑选研究生，我被山东大学推荐上来，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我们上课，最主要的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教程》，这才算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老是被运

动打乱，“三反”“五反”，我是党员啊，就被分配去“打老虎”，一打就打四五个月。这个研究生没读完，又被选送到了中央马列学院。那是1953年初，有从全国各地挑选考来的研究生。胡绳同志当时是一部即理论部主任。我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了两年半。当时有一些苏联学者，是有真才实学的。但是我受益更多的，却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学者，如艾思奇、胡绳等师长。他们的理论与学识，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都给我很大的启发。1951~1955年这四年我读书比较系统，这是读书的好时段。如今回首当年的学习生涯，仍然觉得弥足珍贵。不管那时候所学内容上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管包含着什么样的错误和某些理论误区，但从根本上说，是我打下理论基础的阶段，是思想定型的时期。现在回头想，那四年的研究生生涯，决定了我此后的专业方向，也可以说，决定了我此后的人生道路。

事实上我在1955年之后还有一段较好的读书时期。那年夏天，我奉命调入中央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没有让我去研究政治，而是要我在研究室副主任胡绳领导下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这倒不是个人的特殊机遇，而是当时整个机关的任务，基本上就是从事理论和学术研究。那时候真是得天独厚啊，就像研究生生活的继续一样，安安静静地认真读了两年书。除了读中国近代的东西之外，还仔细阅读了先秦诸子等等。当然，这时候已经是在工作了，不同于过去做学生，总要拿出点成果来，于是便开始在《人民日报》、《学习》、《读书》等报刊上发表习作，成了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理论阵线上的毛头新兵。

■：我读过您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很早的文章《“哲学通信”评介》，是1956年，很钦佩您那么年轻就显现出来的哲学素养和理论思辨能力。

●：但是当时那个好条件没有持续多久，“反右”一起，从此政治运动不断，研究室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研究室，我自己也被运动的洪流冲击得颠来倒去。我只能抽空读些书，《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各60本全套，居然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字一句读完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在研究室另一位副主任田家英的指导下，从事了一系列农村调查。

我在田家英同志指导下，起草了许多调查报告，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但是我至今认为，截止到“文化大革命”，我在理论和学术领域里较可自傲的作品，恰恰就是他带领我做的农村调查报告。遗憾的是，这些报告经过“文革”洗劫，片纸不存。但是当年参加农村调查的经